

吟罢“明月几时有” 回望“超然”崛起时

看苏轼如何从密州(诸城)开启文坛主盟之路

□刘国胜

欧阳修的嘱托： 苏轼接掌文坛大旗

宋神宗熙宁二年(1069)，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，开始着手变法。在接下来的岁月中，陆续推出青苗法、募役法、保甲法等，遭到以司马光、苏轼、苏辙兄弟为代表的保守派的反对，史称“新旧党争”。

为了避开王安石的锋芒，旧党人物纷纷离朝外任。熙宁六年(1073)，苏辙“闻济南多甘泉，流水被道，蒲鱼之利与东南比，东方之人多称之。会其郡从事阙，求而得之”，到齐州(今济南)做起了掌书记。苏辙的哥哥苏轼，“既通守余杭，三年不得代。以辙之在济南也，求为东州守”。熙宁七年(1074)，苏轼追随弟弟的脚步，来知“山东第二州”密州(今诸城)。

苏轼从杭州通判调任密州知州，官职全称是“太常博士、直史馆、权知密州军州事”，虽然还是七品官，属于平调，但毕竟是干上了地方一把手，可谓意气风发。到了熙宁九年(1076)正月，苏轼的官职又变成“尚书祠部员外郎、直史馆、知密州知州事、骑都尉、借紫”，升职为六品。可见，苏轼的密州时期，仍处于“事业上升期”，这在其被王安石挤出对庙堂中心的大背景下，取得这番成绩实属不易。

除了职级的擢升，苏轼还要在密州准备另一件大事，那就是继欧阳修之后，主盟大宋文坛。欧阳修已于熙宁五年(1072)去世，苏轼在《颖州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》中记下了欧阳修当年的殷殷嘱托：“此我辈人，余子莫群，我老将休，付子斯文。”欧阳修的意思是：“你是我辈中人，其他人难以相比，我将年老休息，文坛的事就交给你了！”

欧阳修以文章冠绝天下，一生诗文多著，继晏殊之后，成为一代文宗。欧阳修对“三苏”都有知遇之恩，他保举苏洵在朝廷做官，并在嘉祐元年(1056)主持礼部考试时选拔出了苏轼、苏辙兄弟。欧阳修和苏氏兄弟从此有了师生的名分，苏轼遂向恩师呈送《谢欧阳内翰书》，其中论述了宋朝开国以来的文学发展史，得到了欧阳修的大加赞赏：“读书书，不觉汗出。快哉！快哉！老夫当避路，放他出一头地也。可喜可喜。”后又对其子欧阳棐说：“汝记吾言，三十年后，世上人更不道著我也。”可见欧阳修对苏轼的极度推崇。南宋王十朋有诗云：“堂堂天人欧阳子，引鞭避逊门下士。文昌斯文大才出，先生弟子俱第一。”直到后来，欧阳修对苏轼说出了那番托付文坛的话：“此我辈人，余子莫群，我老将休，付子斯文。”

苏轼自觉接受了文宗传人的使命。他的弟子李廌在《师友谈记》中记载，苏轼曾坦言：“文章之任，亦在名世之士，相与主盟，则其道不隐。方今太平之盛，文士辈出，要使一时之文，有所宗主。昔欧阳文忠公常以是任付与某，故不敢不勉。异时文章盟主，责在诸君，亦如文忠之付授某也。”意思是，文脉传承的责任，也在于当世的名士，大家共同主导，才能使文脉传承不至于隐没。当今社会正值太平盛世，文人辈出，应有一个文宗。过去欧阳修曾将这个责任托付给了我，所以我不敢不努力。而未来的文坛盟主，责任就在诸君了，就像欧阳修当年托付我一样。

苏辙的支持： 以“超然”为旨破题

苏轼知任高密，“驱除螟蝗，逐捕盗贼，廩恤饥谨”，仅用了一年时间，就把密州的工作理顺了。别人以为苏轼从杭州到了经济相对落后的密州，即使干了一把手，也未必能快乐，就像他在《超然台记》中所言：“人固疑余之不乐也。”出乎大家所料，苏轼

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即将来临。每到这个节日，苏轼的“明月几时有”便会被反复吟诵。这首词无疑是苏词当中最知名、最优秀的作品之一，可能很多朋友并不知道，这首词跟咱们山东渊源颇深。苏轼写下这首千古名作之时，正在咱们山东密州(今诸城)为官。更鲜为人知的是，苏轼也正是从密州开始，一步一步登上文坛盟主之位。那么，苏轼是如何开启文坛主盟之路的？这要从超然台说起。



诸城超然台前的苏轼雕像。

在密州，虽然生活条件差了些，但与民同乐，生活顺遂，十分畅怀，于是他继续写道：“处之期年，而貌加丰，发之白者，日以反黑。予既乐其风俗之淳，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。”

在工作顺利、生活惬意的条件下，苏轼修复了密州城墙的一处高台，“稍葺而新之”。苏轼经常带人登台四望，“放意肆志”，他既看到了秦代隐士卢敖，也看到了姜子牙、齐桓公、韩信等彪炳史册的历史人物，“时相与登览，放意肆志焉。南望马耳、常山，出没隐见，若近若远，庶几有隐君子乎！而其东则庐山，秦人卢敖之所遁也。西望穆陵，隐然如城郭，师尚父、齐桓公之遗烈，犹有存者。北俯潍水，慨然太息，思淮阴之功，而吊其不终。”可见此时，苏轼虽然“处江湖之远”，内心还是奔涌着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。

但他现在的志向，不是政坛，而是文坛。他要开始着手欧阳修生前的托付——尝试主盟大宋文坛。其实说到底，这也是苏轼在被王安石排挤在外的大背景下，从危局中开新局。

苏轼先请在济南的弟弟苏辙为他“稍葺而新之”的高台命名，“以告辙曰：‘此将何以名之？’”苏辙在《超然台赋》序中说，按照“安于其所”的原则，你现在远离“是非之场”“荣辱之海”，恰好处于“超然不累于物”的状态：“今夫山居者知山，林居者知林，耕者知原，渔者知泽，安于其所而已。其乐不相及也，而台则反之。天下之士，奔走于是非之场，浮沉于荣辱之海，蹙然尽力而忘反，亦莫自知也。而达者哀之。二者非以其超然不累于物故邪？”于是引用《老子》“虽有荣观，燕处超然”之语，为其命名“超然台”。

苏辙同时作下《超然台赋》，他在赋中说，人生不过短短数十载，为何要沉溺于世间的污浊？倚靠在轩台的柱子上长啸，衣袖在风中轻扬飞舞。极目远眺，瞬间就能看到千里之外，将无尽的思绪寄托在云烟之间。“曾陟降之几何兮，弃溷浊乎人间。倚轩楹以长啸兮，袂轻举而飞翻。极千里于瞬息，寄无限于云烟。”最后申明题旨，无论去往何处，只要心中乐观开朗，这或许就是所谓的超然境界吧，“惟所往而乐易兮，此故为超然者耶。”

苏轼要着手主盟大宋文坛，只有找一个易于引发共鸣的好选题，才能得到海内文人的广泛唱和。苏辙帮苏轼从《老子》中

摘出“超然”二字，作为唱和的主题为台命名。苏轼欣然允诺，“予弟子由，适在济南，闻而赋之，且名其台曰‘超然’，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，盖游于物之外也。”苏轼还点评了苏辙的《超然台赋》：“子由之文，词理精确，有不及吾，而体气高妙，吾所不及。虽各欲以此自勉，而天资所短，终莫能脱。至于此文，则精确、高妙，殆两得之，尤为可贵也。”

然后，苏轼广邀像他们苏氏兄弟一样离开权力中心的旧党人物，以为台作赋为名，阐发大儒君子们意趣高超、淡泊名利、游于物外的高尚情操，顺便吐槽下王安石等当权者主持的喧嚣而污浊的名利场、是非地。

天赋异禀的苏轼，一定读过王安石早年的名作《游褒禅山记》，其中写道：“而世之奇伟、瑰怪、非常之观，常在于险远，而人之所罕至焉，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。”苏轼既然以“超然”为题，便反其意而行之，大谈“万物皆有可观”“非必怪奇瑰丽者也”：“万物皆有可观，苟有可观，皆有可乐，非必怪奇瑰丽者也。糟漓滴皆可以醉，果蔬草木皆可以饱。推此类也，吾安往而不乐。”

苏轼继续上升他的论点，即做到超然物外，不要为物所累：“物非有大小也，自其内而观之，未有不高且大者也。彼挟其高大以临我，则我常眩乱反复，如隙中之观斗，又焉知胜负之所在。是以美恶横生，而忧乐出焉，可不大笑乎！”

苏轼在《超然台记》中确定了“超然物外”的论点，遂“命诸公赋之”，掀起了异地唱和超然台的盛事，着手尝试主盟文坛。

首次主盟： 得到文坛众多响应

当时，“苏门四学士”中的张耒已经拜到苏轼门下，《宋史·张耒传》记载，张耒“十七时作《函关赋》，已传人口。游学于陈，学官苏辙爱之，因得从轼游，轼亦深知之，称其文汪洋冲淡，有一唱三叹之声”。

张耒通过曹州知州刘頔(字贡父)，接到恩师苏轼唱和超然台的指示，提笔拟道：“苏子瞻守密，作台于圃，名以‘超然’，命诸公赋之，予在东海，子瞻令贡父来命。”张耒在《超然台赋》中写道：“登高台之岌岌兮，旷四顾而无穷。环群山于左右兮，瞰大海于

其东。弃尘壤之喧卑兮，揖天半之清风。身飘飘而欲举兮，招飞鹤与翔鸿。”

除了苏门弟子，苏轼还广邀亲友、同僚为超然台作赋。

其中一位是文同，字与可，长苏轼近二十岁，皇祐元年进士，是苏轼的从表兄，后来两人还结为了亲家，关系最为紧密。文同当时官陕西洋县，作《超然台赋》以相和，比苏轼以美人：“有美一人兮在东方，去日久兮不能忘。凛而洁兮岌而长，服忠信兮被文章。中皦皦兮外琅琅，兰为襟兮桂为裳……下超然兮拜其旁，愿有问兮遇非常。”苏轼点评该文“意思萧散，不复与外物相关”。

另一位是老乡鲜于侁，字子骏，也长苏轼近二十岁，景祐元年进士，时任京东路转运使，鲜于侁创作《超然台赋》，同样赞苏轼为令他倾慕的美人：“佳人兮何为，超然台兮独处。极劳心兮怅望，登宝峰兮仰止。天之西兮海之东，不惮远兮欲从其游。秣余马兮次余车，道阻长兮不可驰驱。天苍苍兮云垂垂，风雨冥兮愁余思。”

再一位是老同事李清臣，字邦直，皇祐五年进士及第，时任京东提点刑狱，恰好巡游密州，在苏轼陪同下登上超然台，李清臣深得超然之意，即兴作《超然台赋》：“嗤荣名之喧卑，哀有生之烦煎。万有不接吾之心术兮，味逍遥之陈篇。蛾眉弗以为侍兮，识幻假于朱铅。虽巫神与洛妃，吾不睹其为妍……世所甘处，我以为患兮。物皆谓危，己所安兮。”

此次与苏轼《超然台记》的唱和，除了苏辙、张耒、文同、鲜于侁和李清臣的五篇赋，有资可查的还有司马光与文彦博的两首诗。

司马光字君实，宋仁宗宝元元年进士，神宗即位后，司马光升任翰林学士，竭力反对王安石变法，是旧党的领袖人物。司马光所作《超然台寄子瞻学士》，应该是苏轼收到的分量最重的唱和之作。司马光以其在文坛的显赫影响力，直接在诗中把王安石之流比作猛虎，“猛虎须可揽”，而怜爱苏轼为身居陋巷的颜回，“比之在陋巷，为乐亦何歉”。

文彦博，字宽夫，宋仁宗天圣五年进士，曾两度拜相，是大宋的元老重臣，也反对王安石变法，是旧党领袖之一。他也亲自唱和苏轼，《寄题密州超然台》一首，夸赞苏轼“名教有静乐，纷华无动心”。苏轼又回诗一首，《和潞公超然台次韵》，感谢老领导“吟成超然诗，洗我蓬之心”。

“超然”之后： 人生低谷与艺术高峰

苏轼在密州修建超然台，这是他首次尝试主导文坛，以“超然”为题，激发了众多文人的响应，展现出他在文坛的巨大影响力。熙宁九年(1076)中秋，苏轼创作了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，此词一经问世，又引发了广泛的反响，掀起了传播的热潮。苏轼的文坛地位逐渐确立，这给王安石等新党执政者带来了巨大的舆论压力。

然而，元丰二年(1079)七月，御史李定等人弹劾苏轼，指责他在诗文中讽刺朝廷。苏轼主盟文坛的后果终于显现出来，他很快被捕，八月入御史台监狱，十二月虽获释，却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。仿佛有一个可怕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：“你不是能‘超然’吗？那就多给你几次‘超然’的机会！”

自此，苏轼的人生陷入了难以挽回的低谷，黄州、惠州、儋州的三次贬谪将他推入了荆棘丛生的困境。然而，苦难是思想的养料，也是艺术的源泉。令人欣慰的是，这三次贬谪反而将苏轼的诗词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峰，使他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文宗领袖。正如《宋史·欧阳修传》所记：“当元祐间，世人皆以欧阳公为苏轼伯乐，而独称苏而不称欧。”然而，我们不应忘记，这一切都始于苏轼在密州修建超然台，发起“超然”唱和的那一刻。